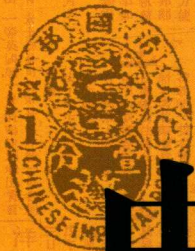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 ⑧

[新加坡] 卓南生 著



中国近代 报业发展史

1815~1874

增订新版

循 環 日 報



[新加坡] 卓南生 著

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潘金魁

1815~1874 增訂新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新加坡)卓南生著.—2版
(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5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

ISBN 978-7-5161-6268-2

I. ①中… II. ①卓… III. ①报纸—新闻事业史—研究—
中国—1815~1874 IV. ①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1974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小颐 田文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5年5月第2版
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1.5
插页 2
字数 600千字
定价 9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

总 序

程曼丽 [新加坡]卓南生[※]

经过一番甄选与琢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它既是学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集萃,也是吾辈向创会前辈敬献的一份厚礼。

历史上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由时任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起并担任会长,他同时聘请留美研习新闻学归国的徐宝璜、《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研究会的导师,这三人也因此被称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三驾马车。

蔡元培校长亲自起草研究会章程,确立研究会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学会拟定的章程、宗旨,学会开设的课程,出版的刊物、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学科建设最初的范本,也使北京大学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摇篮。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很多是当时的进步学生,其中的一些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有一些成为著名的新闻人。据史料记载,在获得证书的55人中,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人的名字。这段往事已经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按照惯例,许智宏校长任会长,并聘请首批10位海内外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光明日报》用整版篇幅介绍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及恢复成立的情况;人民网对导师聘

※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卓南生,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任仪式进行了全程直播报道。

恢复成立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力求开拓进取,创造新的业绩。

复会以来,研究会连续举办了五届年会,主题分别为“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暨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东亚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反思”、“新闻史论教育与研究面临的难题与困惑”、“如何研究新闻史? 如何弘扬学术精神——以《新闻春秋》公开发行为契机”、“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主体性的再思考”。

复会以来,研究会传承历史,连续举办了五届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截至 2013 年,毕业学员达到 100 名。学员来自国内三个新闻机构、一所海外大学和 64 所国内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等。2011 年,特训班学员自行成立了同窗会,2012 年和 2014 年又相继成立了两湖分会和东北分会。

复会以来,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 40 多次北大新闻学茶座。光临茶座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学者和业界人士。茶座讲座的部分内容刊登在《国际新闻界》、《世界知识》、《参考消息》、《新闻春秋》、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和财团法人卓越新闻基金奖的网站上。近年来,北大新闻学茶座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学子,形成了一个跨国、跨界、跨校、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

复会以来,研究会出版《北大新闻学通讯》13 期(第 14 期正在编辑中),并且开设了专门的网站(<http://ioj.pku.edu.cn>)和专门的公共邮箱(iojpku@126.com)。

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基礎上,2013 年 7 月,学会成员首次走出国门,与韩国言论学会联合举办有关两国媒介产业发展的研讨会,搭建起了中韩两国学者可持续交流的平台。

2013 年 11 月 9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支持下,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举办了“十年再出发——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各部委十数位新闻发言人与会并围绕如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民网、中国网全程直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作了大篇幅的报道。论坛文集《十年——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复会以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在海内外新闻传播学

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之际,新闻学著名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方汉奇先生对于北大的新闻学教学、研究作出这样的评价:“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了。她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方面拥有四个全国第一,加上站在她背后的北大的声望和影响,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已经后来居上,跻身于中国新闻教育的第一团队。希望她脱颖而出,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继续努力,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参见方汉奇教授 2011 年 5 月 29 日的微博)2013 年 12 月 21 日,在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 95 周年复会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方汉奇教授作为学会成长的见证者,在发言中强调:“从复会到现在,会员们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众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后五年的工作已经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期待她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是研究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全面展示。它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经典新闻学著作的再版,研究会导师的研究成果,特训班学员的优秀成果以及研究会学术活动荟萃。我们的初衷和心愿是:通过“文库”的出版,贯通“古今”,延续血脉,传承薪火,砥砺前行,让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对吾辈而言,这也是一份历史责任。

2014 年 10 月 14 日

复会六周年纪念

自序

——我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 若干思考和体会

如果说,笔者在20世纪70年代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初20年,基本上是寓居东瀛,或者说,只与日本新闻史学界交往和切磋,而颇有“踽踽独行”之感的话,最近20余年来接触与交流的对象,可以说已逐步扩大至中国新闻史学界的主流。为此,笔者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娱自乐地钻研我自家流的新闻史研究,也不能不同时分享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界对相关课题研究存在的苦与乐。特别是在1998年拙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繁体字版)于台北出版、2002简体字增订版在北京面世之后带来的反响,更迫使笔者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论,不能不有所思考和回应。

笔者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初访中国大陆并和中国新闻史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至于在中国各大学正式开课和参与或担任硕士、博士生导师,则始自2000年。其间最发人深思的,莫过于过去五年间身兼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主办的五届“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的学术总指导,与百名来自天南地北的青年学员的直接对话与探讨。

换句话说,从“寓居东瀛”的“踽踽独行”到转战神州,欣叹“吾道不孤”之余,笔者也责无旁贷地得回应中国青年学子乃至中国新闻学界当前面对的研究困惑与烦恼,特别是与拙著相关年代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课题。其中既牵涉到拙著的命题、立论,也涉及新闻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现借拙著增订新版付梓之良机,分别论述如下。

一、“近代中文新闻纸成立史”研究的意义与问题意识

首先,是有关拙著对“近代新闻纸”(即“近代报纸”,modern newspapers)的界定和拙著撰写的基本问题意识。

也许是因为本书十分重视论据,重视第一手资料(着重报刊等原件之发掘与利用),并附有甚多与本文相互印证的图片的缘故(特别是简体字增订版,还附有79份《香港船头货价纸》原件的复印本),致使一部分学者将之列为“文献学”或以考据为中心的“考据学”著作。

实际上(至少是我的主观愿望),重视与发掘原件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加强论据。本书的命题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绪论中的第一句话:

本书旨在以新的论据与观点,揭示自1815年伦敦布道会在马六甲(亦译为麻六甲)创办的第一家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发行开始,至1874年由中国人出资自办成功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在香港诞生为止的60年间,中文报纸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征与意义。

换句话说,正如新闻史学界前辈宁树藩教授在评介本书(繁体字版)时指出的一样,本书的重点(原文为“贡献”,指“取得的重大进展”),是在回答中国报纸(按:指“近代报纸”)是“怎样而来的”的难题(见本书简体字版[增订版]附录II)。他指出:

我们知道,中国中文报纸的历史实际上是鸦片战争后从香港起步的。香港这阶段报史,是一部中国新闻史的源头。历史学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各种事务都是怎样而来的。(罗素)

诚然,笔者长期努力寻觅各种早期中文报刊的原件或准原件,从而摸索与探求各报刊之创刊缘由与特征,最终都回归至如下的原点(即问题意识):近代中文报刊是“怎样而来的”?说得更清楚些,为近代中文报纸正本清源,是本书最主要的目的。

也许,更能准确表达本书意旨的,是1990年百利坚出版社发行的日文版之书名:《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 1815~1874》。此书是笔者在1986年向立教大学社会学研究院提呈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的。原题为:《近代型中文报纸的形

成过程与确立——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至1874年〈循环日报〉的诞生》。

日文版“成立史”，或者说学位论文的“形成过程与确立”等关键词，可以说更确切地表达了笔者力图厘清“近代化中文报纸”或“近代型中文报纸”从雏形逐步演变为完整报纸全过程的问题意识。如此这般有针对性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是始自1970年考进研究生院的年代，笔者1972年提交的日文硕士论文原稿就是：《关于19世纪华字新闻纸产生之缘由（日文原文为“发生事情”）与特征的考察（1815~1856）——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遐迩贯珍〉为中心》。

二、“宗教月刊”与“新报”的连续性及其不可分割性

所谓“近代中文报纸”，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指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境内（包括香港）发行的中文“新报”。在这一点上，笔者认同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对近代史分期的界定，无意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与传统的说法唱反调。拙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之所以将研究年代追溯至鸦片战争前的1815年，发行地点之所以延伸至马六甲等东南亚华人聚居的区域，是结合中国近代中文报刊从萌芽、成长与演变的曲折与特殊的历史过程予以考虑的。为方便说明（当然也是基于对早期各报刊研究的归纳与总结），笔者将始自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止于1858年闭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称之为“宗教月刊时期”，而将1857年以后以“船头（ships）”和“货价（commerce）”为象征，与商品社会紧密挂钩、在香港发行的三大“新报”，列为“新报时期”。

鉴于中文“新报”与中文“宗教月刊”有着前后不可分割的关系，笔者在谈论与探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时，特别是在追溯其源头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详述“中国近代中文新闻纸”产生的全过程，即从其雏形（即“宗教月刊时期”）谈起。

针对“宗教月刊”与“新报”的关系，笔者在中、日文版绪论的第一个长篇注释中，已经清楚地交代。为方便说明，现重录如下：

19世纪萌芽期近代化中文报业的特征之一是“报纸”与“杂志”尚未严格区分，有人称之为“报纸杂志混合型”（见冯爱群编著《中国新闻史》，第42~50页），或泛称之为“报刊”。其二是报纸的出版周期由长而短，从月刊逐步发展为日刊。尽管办报者未必是同一批人，以及主角已逐步从西方传教士转为欧美商人乃至中国知识分子。其三是不管是从版面形式或者内容的变化（如新闻报道量逐步增加，宗教月刊登载市场消息和广告）等方面

来看,当时的月刊与后来的日报是有前后相互影响与不易分割的关系的。因此,尽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宗教刊物在出版周期、版式与内容上与今日之“杂志”颇为接近,但从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是近代化中文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先驱。本书日文版根据日本新闻学界的传统称法,将这些早期的“报纸杂志混合物”依其出版周期称为“月刊新闻纸”(即“月刊报纸”)。但由于“月刊报纸”在中文中很少使用,本书中文版沿袭中国新闻史学界的说法,泛称之为“报刊”,但在探讨上述具体的刊物时,则根据其出版周期而称之为“月刊”。

在这里,注释开门见山,指出19世纪萌芽期近代化中文报纸的特征之一是“报纸”与“杂志”尚未严格区分(有人称之为“报纸杂志混合型”)。接着,是从出版的周期由长而短乃至版面形式或者内容的变化,论述“宗教月刊”与后来的“新报”有着“前后相互影响与不易分割的关系”。

最后,则着重强调应该从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理解“宗教月刊”草创期的特性,不赞同以今日“报纸”与“杂志”严格划分的概念而来否定“宗教报刊”为“新报”鼻祖的传统说法。

同样的,发行于东南亚马六甲等地的“宗教月刊”,尽管不是在中国境内出版,但不论是从传教士报人出版的动机,他们迁往马六甲等地出版的考虑因素,乃至其刊物锁定的受众和最终冀图传播的区域,都离不开“中国人”与“中国”(本书第2章及第3章对此有详细的记述)。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早期在南洋发行的华文报纸,既是东南亚华文报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华文报业史的源头。将它们称为中国近代中文报业的先驱,是丝毫没有错误的。

三、“新报”与传统的“邸报”、《京报》等的差异与自我定位

“新报”与传统的“邸报”和《京报》等是有巨大的差异的。

笔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钻研中国近代报纸的“发生史”时,就留意到草创期中文近代报刊经常自我标榜为“新报”,及引述或转载同时期“中文新报”乃至翻译其他“外文(主要是英文)新报”的报道与评论的现象。笔者之所以在本书中将草创期的中文报刊划分为“宗教月刊”与“新报”两个阶段就是基于长期对相关报刊原件的考究、考察与发现的结果,也可以说是遵循“论从史出”原则得出的些微研究心得。因为在此之前,“新报”的诞生及其特征与意义,似乎并未受到新闻史学界的足够关心与重视,也少有见到提及或论述“新报”的专文或

专著。

为此,本书在绪论中谈到早期香港的三大新报时,除了指出其形态与内容有别于传统的“邸报”、《京报》等“官报”,而被时人称为“新报”之外,还得对“新报”作如下的注释:

为了与传统的“邸报”及《京报》等有所区别,当时的报纸常以“新报”为其报名。例如香港的《香港中外新报》、上海的《上海新报》和汉口的《昭文新报》等。上海《申报》的美查(Ernest Major)最初也考虑将报名命名为《申江新报》,后将之略称为《申报》。为了向读者说明“新报”的内容与特征,该报在创刊初期曾数度刊文解说,并介绍有关香港“新报”的情况。参看上海书局《申报》编印组编印《〈申报〉介绍》,第11~13页;梁家禄等:前引书,第36页。(见本书第一章绪论注释[19])

那么,当时的中文“新报”又是怎样“自我定位”的呢?

笔者在本书第5章(即“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1853~1856年)”)第三节介绍该刊的特征与内容时,除了指出该刊每号都有“近日杂报”(创刊号的目录则写为“近日各报”),重视消息栏之外,便不忘引述编者麦都思在该刊创刊号中对邸报与西方日报的差异所作的如下界定:

在该刊创刊号的序言中,麦都思就指出“中国除邸抄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举动大略外、向无日报之类”的事实,接着则着重介绍西方日报的情况及其功能。他写道:

惟泰西各国、如此帙者、恒为叠见、且价亦甚廉虽寒素之家、亦可购阅、其内备载各种信息、商船之出入、要人之往来并各项著作篇章、设如此方、遇有要务所关、或奇信始现、顷刻而四方皆其详、前此一二人所仅知者、今乃为众人所瞩目焉。

他希望《遐迩贯珍》能多少肩负起此任务,使中国人受惠,“俾得以洞明真理而增智术之益”。

换句话说,麦都思强调邸报的内容局限于“上谕奏折”,读者仅能从中“得朝廷举动大略”;至于泰西日报,不仅价廉,而且还包罗万象,既有新兴商贾关心的“商船之出入”和各方关注的“要人之往来”的信息,也及时登载重要新闻和新奇事务。除此之外,泰西日报的另一特征是快(即时效性)且价廉,它能在顷刻之

间将各种信息传达给无数的众人(即广大的受众),引起受众的关注。这一切都是传统的媒介(邸抄等)所不具有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鸦片战争后受人重视的首家宗教月刊《遐迩贯珍》郑重地向其受众阐明泰西日报的功能与特征,指出它与中国传统的邸报等的差异,并声称将朝着泰西日报的理念和方式办报(该刊每号特辟“近日杂报”栏,及于1855年第一号起特设“布告编”栏目,以“告帖”和“启帖”名目刊登广告等创举,就是该报力图实践其理念与方式的一种尝试),但该报并未以“新报”为报名。

推究其原因,也许办报者认为自己所办的宗教月刊虽然有意模仿泰西日报,但自知与后者还有一定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亦然)视为早期中文报刊从宗教月刊逐步演变为完整的“新报”的过渡期代表刊物,也可称之为转型期的宗教月刊或者“准新报”。

与《遐迩贯珍》同样有意模仿“泰西日报”,在实质上也只能称为“准新报”,但却大胆打出“新报”旗号的,是比《遐迩贯珍》晚一年出版,由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en, 1814~1893)医生1854年在宁波创刊的《中外新报》[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到了第二任编者应思理(Elian B. Inslee, 1822~1871)末期,则成为不定期刊物乃至休刊]。^[1]该刊不仅自称为“新报”,开了中文报刊以“新报”为报名的先河,而且也将同年代的宗教月刊一律称之为“新报”。

例如,在分析《遐迩贯珍》何以停刊,而《中外新报》何以还能生存的文章中,玛高温就写道:

香港新报、名曰遐迩贯珍、现已停止不刊、因刊印之费大、而见售者少、予观其报、与予所著之新报为较胜、而在广售卖者何以见少、在宁售卖者何以见多、此盖江浙人之善于广识胜于广东人。^[2]

同样的,在向读者发布《六合丛谈》即将出版的消息时,《中外新报》就直截了当将之定位为“新刊新报”。编者玛高温写道:

明年正月初一日、上海墨海书馆有新刊新报、名曰六合丛谈、其纸账(原文)有六页每本计卖价钱十二文……^[3]

紧接着,编者还借此良机,向读者阐明“新报”的作用及其服务对象:

予思新报一事、为中外修好之法、盖彼此事务、得有新报载明、则瞭如指掌、甚愿五码头人民具有新报可买、则消息不隔远近、一切国事民事、以及商贾买卖均有利益焉。〔4〕

换句话说,美国在华首家中文“新报”的编者明确指出,“新报”的重要任务是致力于“中外修好”。他希望五码头(即五个通商口岸)的人民都有新报可以购阅。这样一来,不论是远近的消息,一切有关国事民事的消息都能获悉。这对从事商业活动的买卖双方都有好处。

四、中文“新报”的源头就是“载道”

从上述转型期宗教定期刊物(也可称之为“准新报”)的自我定位,及对“新报”的定义与认识的叙述中,不难发现下列的几个特征:

其一是,尽管传教仍是当时宗教定期刊物的主体内容,但已经将其视野扩大至香港和通商五口岸新兴商贾阶层(即雏形经济市场)所期待的商业活动信息。

其二是,在介绍和尝试模仿“泰西日报”(即西方“新报”)的办报理念和模式时,转型期的宗教月刊固然穿插和传播不少“新知”和“遐迹”的信息,但不忘将“中外修好”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

在这一点上,鸦片战争后由西方传教士所办、在形式与内容上更为接近“泰西日报”的“宗教月刊”,与鸦片战争前所办的宗教月刊[特别是《南京条约》中英文起草者郭实猎(郭士立)与马儒翰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旨在改善中国人眼中的西人、西学与西教的形象,为西方势力敲开中国大门尽其犬马之劳的自我定位是一致的。1854年至1861年,由两名分属美国不同教会的传教士玛高温和应思理先后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尽管出版序号没有“连续性”,但不论是在形式或内容上,前后期《中外新报》的基调是保持其“连续性”的。两者的共同编辑方针和手法,都是采取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和以美国利益为依归的“国益论”。〔5〕足见最早将西方“近代报纸”(“新报”)概念引进到东方的传教士(不论是来自伦敦布道会还是美国不同的教派),与其说是在传播“新知”和引入“客观报道”的理念,不如说是带有强烈的“说教”的“神圣任务”。

从这个角度来看,将“新报”与“新知”简单地画上等号,显然并不符合草创期的“近代中文报纸”在东南亚和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及中国东南沿海开放通商口岸创始之宗旨与实践的实际情况。同理,将“文人论政”视为中国人办

报独有的传统和特有现象,也不符合报史的基本事实。

认真追溯中国近代中文报纸发展史的谱系及其源头,不难发现,被视为近代中文报刊鼻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其发刊词的序中,就开宗明义表示该刊的中心内容是“讲道理”。编者米怜不仅强调“察世俗必载道理”,还指出其优先顺序为“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国俗”。足见作为“新报”源头的“宗教月刊”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讲“道理”(以“神理”为中心),即“文以载道”。至于介绍“新知”、传播“新知”,并非摆在其首位。米怜就清楚地将“知识与科学”定位为类似“宗教的仕女”,坦率地承认《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之所以介绍西洋知识,与其说是为了普及科学知识,不如说是为了与中国人的传统天文学知识,即“关于神与宇宙的错误观念对抗”。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更把该刊的首要任务定位为改变中国人对西洋人的“偏见”——即维护欧美旅华人士的共同利益,其说教味更浓(详文见本书第4章第四节)。

由此可见,不论是以“神理”为重中之重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还是鸦片战争前夕公然扬言旨在改变中国人对西洋人的“偏见”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或者鸦片战争后在《南京条约》(1842年)和《望厦条约》(1844年)庇护之下在香港和五个通商口岸“播道”的欧美传教士们所办的诸家“准新报”(特别是美国人在华首家中文报刊《中外新报》),都不忘其根本任务是在“载道”和“说教”。

说得更加确切些,在西方“政、教、商”三者一体,倾其全力维护欧美在华共同利益的背景下,由热心“播道”的传教士率先引介至中国及其周边区域的舶来品——“近代报纸”(即“新报”)及其前身的“准新报”和“宗教月刊”,从其创刊的第一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一卷第一号第一页,1815年8月5日)开始,就毫不含糊地摆明其办报的首要宗旨,就是讲“道理”,也就是“文以载道”。换句话说,“近代报纸”概念的东传,是与传教士编者旨在引进西洋人世界观的总体战略目标分不开的。

五、“新报”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了解了“新报”之源头就是高举“文以载道”旗号的基本事实,我们再回头看中国人自办成功的首家中文报纸,也是有“中国首家政论报纸”之誉的《循环日报》,就不会简单地将之定位为“中国人爱谈政治”或者王韬继承中国文人的传统,喜爱论政(即“文人论政”或“文人办报”)的结果了。

恰恰相反,中国首家政论报纸《循环日报》的诞生,正如本书结论章所考察一般,是香港报业先驱者对西人引介和操纵下的“新报”的不满和反弹:

——它(指《循环日报》)将西方传教士旨在改变中国对外态度的传播媒介——报纸,转而成为中国人自己论政的讲坛(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该报同仁深知报纸的功用,也深知只有中国人自己出资、自己主持的中文报(甚至是外文报刊),中国人的利益才会有所保障。

——从上述三家报纸(按:指《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华字日报》的前身《中外新闻七日报》和《循环日报》)立论的差异与演变,可以清楚地看出传媒控制权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正是在自己的体验与实践的过程中,萌芽期近代中文报的先驱们充分认识到外资控制下的传媒,言论受到诸多限制。这些强烈不满的情绪,也正是促使他们出资自办报纸的原动力。从这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么说,萌芽期中国近代报业史,其实正是一部中国人要求摆脱外国势力对传媒的控制,争取言论自由,从而表达国家民族意识的斗争史。

——当时的香港报人由于最早接触外界,既看清来华西人的不怀好意,又洞悉国际形势的走向;他们也对腐败的中国政府表示不满,殷切期望中国富强。因此,当他们在争取并掌握传媒这项工具之后,即逐步地发挥了忧国忧民、要求改革的舆论作用。这是我们在回顾与总结早期报业史时,应该予以高度评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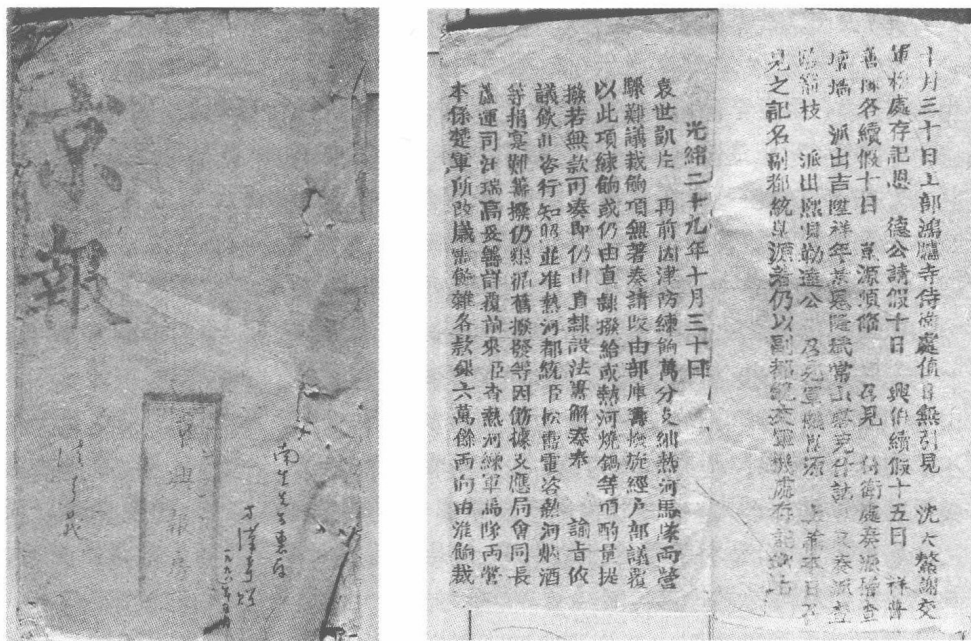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中国人自办的“新报”(特别是重视政论的“新报”),之所以有较为鲜明的批判性色彩,并不单单是由于中国文人独特的传统,而是与西方“新报”这一新型媒介引进中国的特定时代背景和过程分不开的。从外人出资、外人主宰的“新报”到中国人出资、中国人操权的“近代报刊”,从任由外人“说教”、外人“诱导舆论”到力图摆脱外来势力的干预与牵制、进而畅所欲言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毫无疑问,是中国人自办“新报”的艰辛历程,也是中国人自办“新报”诞生与成长的原动力。

六、“宗教月刊”与“准新报”如何看待与“安置”“邸抄”和《京报》

仔细阅读和比较 19 世纪草创期的中文报刊,特别是宗教月刊,不难发现东来“拓教”的西方传教士报人为开展其“文字播道”工作而引介与利用西方近代报刊这一新型媒介的概念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中国读书人的阅读习惯。他

们也留意到当时在中国的上层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传播信息的古老传媒和管道——即“邸抄”、《京报》(见图1)等。

图1 《京报》封面与内页



(方汉奇教授赠、作者收藏)

为了争取中国的读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早期宗教报刊不仅在形态上迎合中国读书人熟悉的阅读习惯、以小册子面世,并采用由右而左的直排版式,还各在版头页上引用中国古人的名言,并署上自己的中文笔名,以便拉近办报者与中国受众的距离。《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编者米怜的中文笔名是“博爱者”,他在封面刊载的语录是出自《论语》的“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见本书第3章插图3-2);《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编者麦都思的中文笔名是“尚德者”,封面的名言同样是引自《论语》的“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见本书第4章插图4-1)。至于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者、也是《南京条约》的中文起草者郭实猎,更将自己的中文名命为“爱汉者”。该刊的语录同样是出自《论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见本书第4章插图4-2)。

不仅如此,当代中国新闻史权威方汉奇教授在伦敦大英图书馆阅读早期的宗教中文报刊之原件时,还注意到如下的细节:

这份报纸(按:指《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封面是用黄色的毛边纸印刷

的,外观很像国内报房出版的黄皮京报。……我认为,这和在它的封面上印有孔子说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那句话一样,都是一种包装。用孔子的话,是一种思想上的包装;用黄纸作封面,则是一种发行上的包装,目的都在迎合中国读者的习惯。一个是思想上的习惯,一个是阅读上的习惯。〔6〕

以上种种,在在说明了“拓教期”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读书人(即宗教报刊所期待的基本受众)与中国既有的媒体《京报》等的重视。

正因为办报者心目中有上述明确的受众,并对中国固有传媒《京报》的内容和作用保持密切关注,西方传教士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7年5月(丁酉年四月)号的“新闻”栏中,还转载了原刊于《京报》的中国官吏许乃济之奏文《奏为鸦片》〔7〕,开了“近代中文报刊”转载《京报》内容的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该刊在转载《京报》的《奏为鸦片》时,还附有编者按语,强调要禁绝鸦片,“莫若多讲善言、劝人善行、教人以善守志、守道、且广布耶稣之道、除此之外无他方法”。其弦外之音是,鸦片之流毒中国,咎在中国人不信耶稣,不讲“善言”、“善行”,而与英商大量运来鸦片无关。类似的编辑手法和按语也体现在该刊1837年6月(丁酉年五月)号〔8〕和7月(丁酉年六月)号〔9〕转载《京报》的版面上。

由此可见,该刊之首次转载《京报》内容,一方面是反映了传教士报人对中国传统媒体《京报》内容的关注和重视,即将之作为了解、刺探中国朝廷动静与思路的消息源;另一方面,也旨在利用宗教月刊,反驳中国传统媒体对西方不利或西人不认可的言论。

也许最能反映或者说继承传教士报人如此这般的“邸抄观”或“京报观”(包括其先刊载《京报》内容,后予以反论的编辑手法和技巧)的,莫过于鸦片战争后英国传教士在已沦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所办的第一家中文宗教月刊,也可视之为“准新报”的《遐迩贯珍》(1853~1856年)。

从附表1“《遐迩贯珍》有关邸抄、《京报》内容一览表”中,不难发现该刊创刊(1853年8月)后不久,就十分关注来自邸抄或《京报》的消息。先是间接引述可能源自邸抄的报道(1853年11月号),后是在“近日杂报”栏中摘录邸抄(始自1854年1月号)。从1854年7月号开始,《遐迩贯珍》的英文目录中添加了“Extracts from Peking Gazettes (有时写为 Gazette)”栏,即“邸抄或《京报》节录”栏的小标题。自1855年5月号起,该刊的中文目录中的“近日杂报”栏更增添《京报》的小标题。到了最后两期,《京报》的内容则移至“近日杂报”栏之前。